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 汉字在日本的文化意义研究

刘元满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字在日本的文化意义研究/刘元满 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7  
ISBN 7-301-06354-7

I. 汉… II. 刘… III. 日语-汉字-文化-研究 IV. H3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5433 号

书 名：汉字在日本的文化意义研究

著作责任者：刘元满 著

责任编辑：胡双宝

标准书号：ISBN 7-301-06354-7/G·0883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http://cbs.pku.edu.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8

排 版 者：北京华伦图文制作中心 82866441

印 刷 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890 毫米×1240 毫米 A5 开本 8 印张 230 千字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5.00 元

## 序

严绍盪

文化人类学家普遍认为，以人类从石器工具时代进入金属工具时代作为标志，世界上出现了四大文明区域，这就是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文明、幼发拉底河流域与底格里斯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恒河流域的印度文明和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华文明。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印度文明，在各自独特的历史时期中，相继中断本身的发展而“变异”为另一种文明的形态。以黄河和长江为依托的“中华文明”，不仅没有出现进程的断裂，相反，这一文明超越了生成的本土，在亚洲东部地域形成了一个以“汉字文化”为中心纽带的“文明区域”。这一文明区域包括了本土、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中南半岛的东部。在这一广袤的地区中，尽管各民族形成并发展起了自己的丰富多彩的本土文化，但是，几乎所有这些民族文化，都曾经广泛地使用“汉字”作为表达自己内容的载体，作为记录自己语言的书面工具，从而，形成了一个地域广阔、历史长久而文明进程未曾断裂的“汉字文化圈”，组成世界文明史的重要内容。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东亚文化史的研究，着重于在国别范围内阐述“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在涉及东亚各民族文化的不关系的研究中，也主要是执著于诸如思想，哲学，文学，伦理，艺术等的“雅文化”层面。多少忽略了作为构成“东亚文明”的历史性载体的“汉字”所具有的最基本的文化意义的思考、研究和相应的阐述。由于缺乏了对于“汉字文化”意义层面的把握，我们对于东亚文明区的“文化内涵”的理解，有时候难免就会出现一些偏颇，例如，有一部分学者把“东亚文明区”称之为“儒学文明区”，就是因为缺少了关于对“东亚文明区”内以“汉字”为各民族各国家文化基本连接键的知识，从而导致了“非事实性的描述”。

“汉字”的“文化学”研究的落伍，是由很多的原因造成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把“文字”列入“小学”的范畴，从而，即使学术界对于“汉字”的研究已经获得了近代的观念和方法，但是其研究的范围，也主要还是更多地在“文字学”的范畴内展开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们创导“汉字文化学”，开创了对“汉字文化”的研究<sup>①</sup>。从而为进一步阐发“东亚文明区”的文化内涵提供了具有积极意义的启示。

关于“日本汉字”的文化意义的研究，中日学者也曾零星涉及这一领域，但未见有系统的表述。北京大学刘元满博士以这一主题为中心，撰写成专著《汉字在日本的文化意义研究》，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在“汉字文化学”领域中，以中国和日本的原典文献为基础，辅之以扎实的学术调查（此即现在文化学研究中所称的“文化田野作业”），精心思考，提升认识，从而事实有据地阐述了“汉字”东传日本列岛透入其本土文化的历史过程，比较系统地研究了“日本汉字”的文化学意义。具有相当的学术意义。

刘元满博士曾师从潘兆明教授在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学中心攻读硕士学位。1996年到2001年又在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攻读博士课程，于2001年6月获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她对于“汉语”和“汉字”具有浓厚的兴趣，常有许多深入的思考。在博士课程期间，她曾经在日本山梨女子短期大学从事教学两年，有机会就“日本汉字”这一主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学术调查，对于“汉字”东传日本并逐步地渗透入日本本土文化的历史图谱有了比较确切的把握，在此基础上，她考察了“日本汉字”在日本文明的进程中所体现的“文化学”价值，从而构成为博士学位论文的核心内容。本书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又作了再思考和再提升，现在贡献于读者的面前。

我作为刘元满博士论文的指导教师和本书的第一个读者，从她的思考和表述中获益良多，这倒不是客气的言辞。我虽然从事东亚文化和文学关系的研究，特别是中日文化和文学关系的研究已近三十年了，但是，关于“汉字文化学”和“日本汉字文化学”的知识，却只是零星和片断的。本书以五章十五节三十余万字的宏大篇幅，追踪学术界先辈研究汉字文化的踪迹，阐述汉字传入日本列岛的历史过程，分析汉字在日本文化中的“交融”与“变异”，探讨“日本汉字”的文化意义，并借鉴历史的经验，研讨了中日“汉字”在近代社会中的关

<sup>①</sup> 参见何九盈，胡双宝，张猛主编《中国汉字文化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何九盈《汉字文化学》（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等。

联和影响。作者对于如此纷繁复杂又丰富多彩的文化现象，进行了具有学术意义的梳理，对于多种原典材料，清理整合，排比清楚，层次分明，其论说叙述有致。从而，在“汉字文化学”领域中，中国学者第一次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见解。

我在阅读本书时，觉得特别有意义的是，作者对于中国学者在理解上比较混乱的日本文化中“汉字”与“假名”的混用、以及“日制汉字”的形成与它的文化意义及其变迁等，都作了具有学术意义的阐述。本书的重点在于阐述汉字作为日本文化系统的重要支柱的价值和作用。过去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主要是以日本汉文学为中心的“文人文化”为对象加以展开论述的，而本书则着力于开发“日本汉字”在通俗文化以及皇权文化中的意义。这些领域的研究，常常为一般人所忽视，其实，正是在这些领域中，蕴藏着汉字文化的丰厚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说，本书为我们认识“日本汉字”的文化意义打开了一个有趣味的新天地。我还要特别提出的是，关于中日汉字文化在近代的关联和影响，这是一个长期被学术界所忽视的领域，作者对此作了许多的实地调查，考证了许多实地的材料，并且在日本与相关的研究者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本书中所阐述的一些观点，其作用将是积极的。

本书是作者数年来的心血之作。尽管关于“日本汉字”在日本文化中的意义还可以作更多层面的分析和阐述，但是，本书所展现的基本的学术路数，体现的原典实证的理念和方法，对于文献和文物资料的把握，对于学术史的追踪，在此基础上所进行的学术观念的构建和提升，使本书不作空口白话之说，从而书中所提出的一系列结论，分析得当，令人信服。有兴趣的读者，一定能够从本书中获得许多有益的知识，并且还可以修正以前从各种断章取义的论说中造成的知识偏见和学术偏见，形成关于东亚文明史的更接近于事实的理解。

严绍璁，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

北京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院学术委员

北京大学教育部“东方学”研究基地学术委员

国际比较文学学会 (ICLA) 东洋研究委员会 (CEAS) 主席

## 导 言

文字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汉字是中国的自源文字，在夏商时代就已经成熟，连绵数千年，不仅成为记录汉语的工具，同时也成为汉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比汉字产生更早的古埃及文、美索不达米亚文等文字，随着该地域文明的衰退而消失，或被其他文字所替代，而汉字直至现在仍然保持着自有体系，表现出极强的生命力。

不同的文化传统，创造不同的文字形式。汉文化向周边传播的同时，也促成了汉字向周边地区的传播。汉字曾经是越南、朝鲜半岛、日本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惟一文字，以中国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汉字圈。尽管意识形态不同、经济水平发展相异，各国之间却依靠汉字这一共通文字而得到很大程度的沟通。

汉字一方面记录了汉文化，既可传之于异地，又可留之于后人，出色地发挥了工具性作用；另一方面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进行调整。汉字圈的消长过程中，语言种类本身固然是汉字产生变化的重要因素，但国家的文字政策、民族的文字意识也都会影响到汉字的发展，因而汉字具有受多种因素影响、制约的特点。

古代汉语以单音节词为主，这一特点使得汉字也是一字一音。由于汉字初始时期主要是象形造字，使它可以不直接与语音联系而独立存在，也就是说汉字的形、义固定下来以后，理论上说可以用多种音去读它而不影响形、义。

物质文化是很容易流传到其他区域被人们接受的，作为记录语言工具的汉字也有这一特点。未自创文字的民族，一般都借用已有的文字。古代中国文化辐射到周边国家，汉字借着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播而被人接触认识，进而被学习并掌握，异民族在学习中国文化的同时也接受了中国的汉字，汉字成为汉字圈的共同财富，在土地广袤、民族众多的各地区具有相当的凝聚力，因而汉字长时期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崇拜。

文字有两个层面的意义：首先，文字是语言的记录工具，在这个意义上，先有语言，后有文字，语言是第一位的，文字是第二位的；其次，文字是人类社会发展至文明时代的标志，在这个意义上，文字是一种文化现象，需要把它独立出来进行研究。正如中国其他文化现象(包括文学)在流入异域过程中都要发生“不正确的理解”

——变异一样，他源文字的汉字也必须经过变异，即经过吸收、消化、再创造之后才能融入本土文化。汉字圈中成员虽都以汉字为文字(或主要文字)，但在共同的外表之下却有着不同性质的内容。

文字的分布区域，因文化的消长而不断伸缩。时代流转千数百年，越南、朝鲜已退出了汉字家族，韩国的教育用字也不足千。现在语言性质不同而采用汉字的国家严格说来只有两个，即中国和日本。汉字是中国的惟一法定文字，而日语文字系统是汉字和假名的混合型。由于两国对汉字的处理方式不同，汉字在两国的文化表现也就各有特色。

产生于中国文化环境的汉字，逐渐成为记录日本语言的工具，并渗透到日本文化中，成为日本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两国语言系属不同，文化本质也不相同，汉字在进入日本过程中必定会受到排异。为使汉字成为一种记录日语的便利工具，就必须进行相应的改造，如日语文章就从完全使用汉字过渡为汉字假名混用的书写方式。如果只是全盘照搬，不经改造，汉字就永远只能是外文，不会成功记录日语，更不会融入日本文化，并成为其中一个极具活力的组成部分。

共有汉字这一特点，使中日文化交流显现出相当的独特性。汉字对中日两国在艺术、民俗、思想、宗教、社会等广义的文化领域的交流与影响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汉字在日本所形成的文化特征反过来也对中国文化产生一定影响，如日本国字的逆传、新词汇对汉语的补充。过去我们只注意到汉字作为语言工具层面的特点，而较少把它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考察。中日汉字关系源远流长，很多现象仅靠研究汉字本身是无法解释的。中日交流随时代不同而表现出一定的曲线，汉字——特别是以汉字表现的词汇也会相应地有所反映。中日汉字关系研究是研究中日文化关系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

汉字，不能简单理解为中国的文字，它是一个超越国界的概念，如同“汉籍”在宽泛的意义上说也不等同于中国书籍一样。其他国家的汉字与中国汉字有亲缘关系，但不是中国汉字的附庸。过去我国在与汉字相关的文化方面的研究主要局限在本土，认为异域使用的汉字不过是汉字的“遗泽”而已，视野还不够开阔，态度也有欠公允。与此相仿，在日本也有一些国粹主义者，挖空心思要为现存所有文化现象寻找本民族根据，在思想观念上以文化输入国为耻，对外来的文化持排斥态度，因而一度出现“神代文字”的神话。日本在近代发展过程中从欧美国家得到了极大恩惠，新的治国策略使日本一跃成为东方不可小视的国家。由于这种成功是在否定传统、学习西方的指导思想的前提下取得的，结果一些人的政治倾向也表现在对待文化的态度上，

认为汉字阻碍了教育发展。同时由于接触了西方文字，人们有了比较的意识，因此也对一直承担着记录日语任务的汉字产生了怀疑：汉字究竟是否最适合记录日语？汉字的繁难是否阻碍了现代化进程的脚步？日语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文字才能更有效率？日本的文字改革是从1866年（庆应二年）前岛密提出的废除汉字的建议开始的，从此对汉字的认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是主观态度的原因，还是客观研究的需要，日本开始积极研究改进汉字的方法。有人埋头创制新文字，甚至有人提出极端的主张，认为仅仅改变日本文字系统还不够，应该从根本上改换日本语言。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们意识深处是将汉字与社会兴衰联系起来的。

志贺直哉1946年在杂志《改造》4月号发表《国语问题》：“我们从小就受教育而习惯了如今的国语，几乎什么也感觉不到，但我认为再没有比日语更不完善、更不方便的言语了。它在文化发展的进程中起了相当大的阻碍作用，因此现在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不这样做，日本就绝没有希望成为真正文化大国。”他在自身近40年的文笔生活中痛感日语的“不便”，并对社会上流行的几种观点进行比较和评价，认为假名也好，罗马字也好，虽然苦心奋斗数年但都没有成功，特别是罗马字，诸多人士投入了相当的热情却未能普及，其中必定存在致命的缺陷。他谈到60年前森有礼<sup>①</sup>曾提出把英语作为国语，如果真正实行，那么日本一定已得到无限的好处。他还认为与其改造日语，不如干脆使用世界上最好的、最美的语言作为国语，而法语就最适合这个条件。这样他就不仅是对记录日语的文字系统不满，而且更进一步把问题归结到日语本身来了。他的这篇文章也完全按照他的原稿样式编排，全部都是旧假名用法以及旧汉字标记，以表示其蔑视战后日本的国语政策。<sup>②</sup>

由于日本史前没有系统文字，汉字是当时所接触到的惟一的成熟文字，所以在日本人的潜意识里，汉字就是文字。但是在中国鸦片战争之后，日本对世界的了解不再局限在狭小范围内，尤其是目睹中国政治的没落、文化的衰退，不少志士认识到因循守旧的严重后果，而带给西方近代化生活的工业文明使人们认识到先进科学技术的优势。在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改变了过去的做法而全面向西方学习，一下子涌现出大量的新事物、科技术语，汉字在记录新词语方面表现出不足。西方国家已经享受到机械活字的便利，而中国、日本还在进行着传统的低效率的雕版印刷；西方国家已经发明了适应于表音文字的打字机，而汉字离打字机时代还相当遥远。这一切都使得激进派对汉字产生抱怨情绪，直至提出把它打倒，而由其他文字代替的主张。

明治维新以来，政府致力于国民的教育普及，制定的方针政策基本是向西洋一边倒。最初废除汉字采用表音文字的主张是占上风的。但从明治维新开始直到战后，日本的汉字改革并不如一些人所预期的那样。它大概经过了三个主要阶段，即假名文字论——罗马字论——限制汉字论，其间还有其他的主张。

汉字是中国的惟一文字，而日语文字是汉字和假名的混合型。汉字假道朝鲜半岛传入日本，逐渐融入到日本文化中。尽管日本后来发展了假名，出现了完整的表音系统，汉字地位不像中国那么绝对，但字音、字训、振假名、送假名、表记法等表音问题比中国更复杂，因而汉字的重要性丝毫未减。出于对学习者的考虑，加上日语有假名的优势，“限制汉字”成为战后立足于现实的文字政策，汉字的数量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1946年制订的《当用汉字表》有1850字，1981年修订为《常用汉字表》，有1945字，人名用字为166字，而JIS（日本工业规格用字）则有7000余字。

以词汇方面为例，虽然代表新文化的欧美外来词数量猛增，但代表传统的、深层的、精神层面的汉语词汇（包括固有词汇）依然为主干。如《新订日本重要人物辞典》<sup>③</sup>的“人物关系名数”中都是日本历史上政治、军事、宗教、文学等人物，诸如“三大人”、“十二神将”等概称下均有详细人名。除“五人女”一条的女子人名含有个别假名外，其余所有条目都是汉字，包括佛教人物，如宫毗罗、波夷罗等译名。皇名用字一定用汉字，年号名称也必有汉籍出典，这说明汉字文化已经沉积下来，在日本人意识形态领域中起着重要作用。在大众意识中，汉字是日本文字的一部分，与现代生活关系密切，广泛用于各个生活层面，汉字的文化意义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充分展现出来。

从中日两国对汉字的研究状况来说，也都呈现着各自的特色。

一种文化现象究竟在什么时候被借入，我们往往很难精确到具体年代，只能推断出一个大致时间。由于年代久远，史料湮没，汉字研究每一次的重大进展几乎总是继踵考古学取得新成果。关于汉字起源的研究，一直受着实物的制约。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汉字实体，都保留在不易腐烂、能够长久留存的器物之上。从陶器开始到甲骨，继而金石、竹简（木简），直到后来的纸张，汉字的书写材料在不断进步。而汉字的形体也不断地在调整、变化，出现了甲骨文、籀文、篆文、隶书、楷书、行书等。总的趋势是变得易写、易认。有

<sup>①</sup> 森有礼，1847~1889年，曾留学英国，毕业后赴美，1868年在明治政府中任职，曾认为用英语替代日语比较好。1885年任文部大臣，1889年被国粹分子刺杀。

<sup>②</sup> 佐藤喜代治主编《汉字讲座11 汉字と国语问题》，明治书院，1988年6月，第305页。

<sup>③</sup> 《新订日本重要人物辞典》，教育社，1988年12月。

能有更深入的研究，这一点是汉字的故乡得天独厚的条件。

由于汉字不是日语的自源文字，日本接受汉字时已经到公元四五世纪，这就决定了关于汉字的字源研究及音韵学研究只能依据中国古代文化。这种研究与日本古代文化是隔了一层的。在日本，研究汉字最初是汉学家的事。一般来说，汉学家的研究一般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 汉字的字源(包括字形研究)；2. 音韵学；3. 说文学、甲骨学；4. 金石文；5. 书法；6. 万叶假名；7. 国字；8. 日语中的汉语词汇；9. 汉字在日本的发生、发展；10. 汉字与日本历史、文化、生活的关系等等。

如果说前四项与中国学者的研究是重合的，可以资源共享，第五项则有交叉，而后几项的研究就需要与日本的本土文化相结合才能进行，这也是汉字文化在日本的独特表现之处。这些部分不独有学术研究意义，而且对中国的汉字文化研究也极有参考价值。我们需要了解汉字融入日本文化的轨迹，也需要了解汉字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现象在中国和日本有着怎样的不同。我们不能宥于“汉字是中国的”的狭窄视野，不能被所谓的民族感情所左右，必须将汉字文化作为一种世界文化，作为一个学术对象进行客观、科学的研究。

汉字在日本的发展既是作为一种记录语言的工具的适应过程，又是一个作为文化因素的积累过程。汉字进入日本以后逐渐与日语结合，成为有效记录日本语言的工具；日本人的汉字意识也在这一进程中逐渐形成，由上层社会逐渐浸染到民间，从而形成多层次的文字观；汉字对日本社会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同时日本社会的发展变化对汉字的影响作用也不可能低估。

他国使用的汉字不是中国文字的附庸。汉字文化不仅仅属于中国，中国的汉字文化只是汉字文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子系统。汉字从传入日本到现在，受到日本语言、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制约，有完全不同于中国的发展轨迹。本书不是立足于本国文化的以史证字或以字证史的“汉字文化”研究，也不是基于文字资料的文字史研究及探讨文字规律的汉字学研究，但是要利用它们的研究成果。正是由于这些学科成熟、丰富的研究成果，才使本书对“汉字在日本的文化意义”的研究得以展开。本书试图以多元文化观念研究汉字在日本的发展演变过程，分析汉字与日本政治、社会等领域的关系，从而勾勒出脱离中国文化束缚的、与中国的汉字文化相呼应的日本的汉字文化的特点。

# 目 录

序 .....	严绍璦
导言 .....	1
<b>第一章 中日两国汉字文化研究综述</b> .....	7
第一节 汉字文化学的建立 .....	7
1 汉字文化学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 .....	7
2 汉字文化学与汉字学、语言文化学的关系 .....	10
3 汉字文化的界定范围 .....	13
第二节 汉字文化在日本各时期的发展状况 .....	14
1 以词汇为中心 .....	15
2 以汉字研究为中心 .....	19
3 其他与文化相关的研究 .....	23
第三节 日本汉字文化关系方面的研究 .....	25
1 汉字与文化关系的早期研究 .....	25
2 汉字文化研究的现状 .....	27
<b>第二章 汉字文化东渐的过程</b> .....	29
第一节 日本史前的汉字文化因素 .....	29
1 日本远古时期的文化状况 .....	29
2 关于“神代文字” .....	34
3 中国汉字文化因素的传入 .....	39
第二节 汉字东传的渠道 .....	43
1 大陆、朝鲜半岛的移民前往日本岛 .....	43
2 汉字文化发展过程中渡来人的作用 .....	46
3 汉籍的传入 .....	49
第三节 日本汉字文化的蕴藉过程 .....	53
1 汉字记录的实践 .....	53
2 汉字文化的展开 .....	67
3 汉字文化进入意识形态领域——以日本国名为例 .....	70
<b>第三章 汉字融入日本文化的变异方式</b> .....	75
第一节 日本文字体系的确立 .....	75
1 对汉字的音、义进行整合 .....	75
2 片假名进入文字系统 .....	82
3 平假名的产生 .....	86
4 日本文字体系的成熟——汉字假名混用 .....	92
第二节 日制汉字的汉字文化特点 .....	96
1 国字——补足汉字的手段 .....	96
2 日制汉字中的文化意义 .....	101
3 日制汉字的变迁 .....	104
第三节 汉字意义的变异 .....	107
1 汉字的“误读” .....	107
2 赋予词语新义 .....	109
<b>第四章 汉字文化——日本文化系统的重要支柱</b> .....	113

第一节 皇权体系中的汉字文化意义.....	113
1 “天皇”之称体现出的汉字文化特色 .....	113
2 天皇名字体现出的汉字文化特色 .....	119
3 日本年号的汉字文化特色 .....	123
第二节 姓名和地名中的汉字文化意义.....	130
1 普通人名用字变迁 .....	130
2 女子名的特殊性 .....	136
3 从地名看汉字意识的变化 .....	137
第三节 汉字文化与日本普通社会的关系.....	143
1 “鬼”的实质 .....	143
2 好恶情感在汉字文化中的折射 .....	146
3 汉字与文学的关系 .....	152
4 正统汉文形式的权威性 .....	154
<b>第五章 中日汉字文化意义在近代的关联及影响.....</b>	<b>157</b>
第一节 汉字文化在近代的发展与变化.....	157
1 中日之间重要的沟通手段 .....	157
2 近代以来日本汉字使用状况.....	160
3 汉字文化走向共同研究 .....	163
第二节 近代日本词汇标记的变化 .....	165
1 近代词汇的产生及特点 .....	165
2 近现代日本的新词标记特点.....	170
3 日语中的外来词语 .....	173
第三节 中日现代文字生活的影响与交流.....	177
1 日本几种文字改革的主张 .....	178
2 美国在日本文字改革方面所实施的政策.....	180
3 日本对中国汉字改革的影响.....	183
4 新中国成立以后对日本文字的关注状况.....	186
<b>附录 .....</b>	<b>191</b>
1 日本文化史时代区分 .....	191
2 日语国字一览.....	192
3 日本天皇年表.....	200
4 日本的年号 .....	204
5 常用汉字表及人名用汉字别表 .....	208
6 中日汉字活动关联年表 .....	213
7 主要万叶假名一览表 .....	221
<b>主要参考及引用书目 .....</b>	<b>225</b>
<b>索引 .....</b>	<b>231</b>
<b>后记 .....</b>	<b>241</b>

## 第一章 中日两国汉字文化研究综述

### 第一节 汉字文化学的建立

#### 1 汉字文化学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

我国研究汉字的学问——汉字学，古代一直称作“小学”，主要包括文字、音韵、训诂三个方面。受西方语言学思想的影响，1906年国学大师章太炎建议将“小学”改称“语言文字学”，但民国初年人们仍受着以文字统帅语言的思想影响，只接受了“文字学”的名称，尽管研究内容仍是文字、音韵、训诂，不过后来三者逐渐分家。到20世纪50年代“文字学”改称“中国文字学”、“汉字学”，但“文字学”的名称仍在继续使用。80年代裘锡圭的新作拟定名为《汉字学概要》，但朱德熙认为“汉字学”听来陌生，不如按照传统改为《文字学概要》，后来朱先生反省道：“用‘文字学’确实有毛病，因为没有点明是中国文字，是汉字。文字学按照传统的用法，有一定的含义。今天讨论汉字问题超出了传统的文字学的范围。叫文字学概括不了，所以我现在倾向于采用汉字学这个名称。”<sup>①</sup>中国的传统文字学研究呈现着逐渐分化的趋势，现在人们公认“汉字学”这一称法更有科学性，划分也更细致。“现在把汉字学分成‘历史汉字学’和‘现代汉字学’。前者研究汉字形音义的历史演变。后者研究现代汉字的现状和应用问题。现代汉字学的中心课题是‘四定’：定量、定形、定音、定序。”<sup>②</sup>

汉字是汉语，也是汉民族文化的载体，汉字的字理是与造字时的文化背景联系在一起的，汉字与文化的关系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题目，过去已经有人涉及过，但是或在文字学的范畴里进行，或在语言学的范畴中进行，没有形成独立的体系。20世纪末，对于汉字文化研究来说是一个历史转折时期。80年代开始，中国展开了一场语言与文化的论争。这场论争是针对过去几十年来，语言学研究偏重于结构描写而展开的。“汉字文化”的概念提出之后被普遍接受，汉字本身所反映的文化现象以及汉字与语言、社会、汉文化以及人们的思维方式等关系成为新的研究热点，人们探讨汉字文化的最终归属，研究汉字文化的性质和特点，汉字文化成为一个独立的客体，研究在不断扩展并深入下去。

“汉字文化学”是从这一讨论中产生出来的新学科。1987年李玲璞提出了“汉字文化学”的构想，同年在华东师范大学开始招收汉字文化学方向的研究生。何九盈等1990年在《简论汉字文化学》<sup>③</sup>一文中探讨了汉字文化学的性质，认为它是“一门以汉字为核心的多边缘交叉学科”，提出了汉字文化学的任务并探讨了与相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编《汉字问题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语文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1页。

② 周有光《比较文字学初探》，语文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17页。

③ 见1990年《北京大学学报》第6期，该文为《中国汉字文化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月）的绪论。

邻学科的关系。1991年11月，在东京举行的“汉字文化圈的历史与未来”第二届国际研讨会上，陈章太认为，不远的将来一定会产生出汉字文化学这门新的学问<sup>①</sup>。继而研究汉字文化的书籍不断问世，有的还直接冠以“汉字文化”的名称。作者的着眼点都不是具体汉字的形音义问题，而是将“汉字文化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此前提下，进行新层次的文化研究并试图建立汉字文化学的学科理论。

1995年出版的《中国汉字文化大观》是第一较全面地揭示汉字文化的著作。作者将汉字文化学与汉字学、汉字文化学与文化语言学当作同等关系看待，“汉字文化学是一门以汉字为核心的多边缘交叉学科。尽管研究工作还有待于深入，但这门学科的总任务已非常明确。一是阐明汉字作为一个符号系统、信息系统，它自身所具有的文化意义；二是探讨汉字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也就是从汉字入手研究中国文化，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汉字。”<sup>②</sup>这里明确限定“汉字文化”的研究任务之一是研究汉字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该书可谓工程浩大，撰写者有47人之多，内容涉及与汉字相关的多种学科。在《大观》绪论中阐明了该书的任务：“要展示汉字文化的方方面面，它虽非理论性的学术专著，也无意于全面表现汉字文化学的理论价值，但它对汉字的历史和特征，对以汉字为载体的辉煌文明，对汉字的研究和教学，有较系统的介绍、论述，这对于汉字文化学的建设有重要意义。”<sup>③</sup>

如果说《大观》所做的主要还是爬梳整理工作，那么经过近几年的进一步研究，汉字文化学终于有了代表性的理论著述，2000年1月出版的何九盈著《汉字文化学》，为汉字文化学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他不仅论述了汉字文化的研究史、理论背景和方法论，而且指出了汉字文化学的研究内容。他认为“汉字文化学”一词的结构应切分成“汉字文化/学”，而非“汉字/文化学”。“从文化体系而言，‘汉字文化’是汉文化的一个子系统，是汉文化的一个部分。从汉字体系而言，汉字文化学是汉字学的一个分支。所以‘汉字文化学’也可以转换为另一种结构形式：文化/汉字学。”也就是说“汉字文化学”是建立在“汉字文化”基础上的。“‘汉字文化’指的是汉字的文化内涵。汉字涉及到万事万物、方方面面，汉字文化自然也会涉及到万事万物、方方面面。”<sup>④</sup>在论述汉字文化学的任务时，他强调既要讲本体，又要讲关系，“立足于本体，以本体的研究为基础进而探讨汉字文化与整个汉文化的关系，汉字在汉文化中的地位，对汉文化的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等等，都是汉字文化学的任务”。<sup>⑤</sup>

② 沟口雄三、富永健一等编著《汉字文化圈の历史と未来》，大修馆书店，1992年11月，第15~16页。

① 何九盈、胡双宝、张猛主编《中国汉字文化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0月，第5页。

② 同上，第11页。

③ 何九盈《汉字文化学》，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第48页。

④ 同上，第52页。

## 2 汉字文化学与汉字学、语言文化学的关系

我们承认,从文字体系而言,汉字文化学是汉字学的分支,从文化体系而言,汉字文化学的研究内容又与汉文化有关,但“汉文化”这个概念需要廓清。“汉文化”不等于中国文化,相对于包括蒙古文化、苗瑶文化等民族文化在内的中国文化,它是下位概念,而相对于包括其他国家的汉文化而言,它是中国文化的上位概念。汉字作为记录语言的工具,不独属于中国、汉民族,它还是“汉字文化圈”中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使用文字。汉字在这些地区有不同于中国本土的发展变化,汉字文化的研究在这些地区也很盛行。因此“汉字文化”的范围不能仅局限于中国,而应包括所有使用汉字的地区。汉字文化因地区、语言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特点,而这正是汉字文化的研究内容之一。如果从使用国别来看,现代的汉字文化可以分成中国的汉字文化、日本的汉字文化以及其他国别的汉字文化,而它们分别又与自己国别的文化相联系。汉字文化与中国文化相关联,汉字文化也与日本文化相关联,它们与使用汉字的其他民族文化共同构成了汉字文化的研究基础。因此汉字文化学的研究范围应该是超越汉民族、超越中国国界的。

汉字文化与中国语言文化学有关,但不是附属关系。20世纪80年代初期汉字文化是被作为中国语言文化学的一个分支来研究的。过去对汉字的研究局限在汉字的形音义方面。由于汉语词汇大多是一字一词,古汉语中尤其如此,汉字的形、音、义包含着很多文化特点,再加上在使用汉字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特殊文化现象,这些都容易引起误解,认为字即是词,词即是字,既然词属于语言的范畴,词又是靠汉字记录的,那么把汉字文化看成语言文化学的分支似乎是说得通的。但随着研究的进展,人们发现汉字文化的内容和特点都无法包容于这一学科,必须独立对待。它与中国语言文化学有关,一定程度上还要依靠该学科的研究成果。但汉字并不从属于语言,语言与文字的概念必须分开。“语言与文化”、“文字与文化”、“文字与语言”都是不同领域中的概念,它们之间有互动的关系,但绝不能混为一谈。语言重点在词,词可以用多种文字来记录,如中国的“房间”一词,用英语记为 home,而用日语则可记作“部屋”、“へや”、“へヤ”、“heya”等形式。文字重点在字,它由成系列的符号组成,表音文字系统中每个字都必须有形、有音,表意文字(或曰表词文字)还要加上义。一种文字可以记录不同的语言,如汉字可以记录汉语,也可以记录日语<sup>①</sup>,历史上还曾记录过韩国语、越南语。拉丁字母既可以记录英语、法语,也可以记录越南语、土耳其语等。

过去比较权威的看法是语言性质决定文字形式,如认为印欧语适合使用拼音文字,而汉语适合使用表意文字。周有光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他发现在汉字文化圈中,汉字“所书写的语言有彼此完全不同的汉藏语系(藏缅、苗瑶、壮侗等语族)、阿尔泰语系,还有其他难于确定语系的语言”。所以他认为“文字形式不决定于语言的特点,而决定于文化的传播”。“印度文化传来中国,由于汉字的抵抗,印度文字没有一同传来。西洋文化传来东方,使越南放弃了汉字,改用拉丁字母。朝鲜北方放弃汉字,专用谚文字母;南方继续用汉字和谚文的混合体,大量减少汉字。日文从汉字中夹杂少数假名,变为假名中夹用少数汉字。汉字文化圈的外围正在萎缩,但是文化圈的核心得到强化。汉字经过现代的整理,在中国国内发挥更大的作用。”<sup>②</sup>

① 日本在假名创制之前曾用“真名”书写文章,真名即完整的汉字,与取汉字部分而成的“假名”相对。

② 周有光《比较文字学初探》,第116页。不过“日文从汉字中夹杂少数假名,变为假名中夹用少数汉字”的说法有些以偏概全。

关于汉字文化的专门探讨到 20 世纪 90 年代掀起一个高潮，1996 年《汉字文化综论》试图穷究“汉字文化学”之根本，作者提出：“汉字文化研究就是以汉字的除语言交际职能以外的外文化机制，也就是以汉字与语言交际以外的中国文化方方面面的联系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具体说来，这门学科有两方面的任务，一是探究汉字自身构成与种种文化现象联系的规律；二是探究这种联系的内容。”该书对《中国汉字文化大观》中的“从汉字入手研究中国文化，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汉字”的研究方法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这两项工作“都不属于真正的汉字文化学的研究”，而把它们“视作汉字文化研究的边缘领域或许是比较恰当的”。<sup>①</sup>

1996 年还有一部《汉字文化引论》，行文中未见汉字文化的具体定义，不过它规定了汉字文化的研究对象为“汉字与中国文化之间的深刻复杂的关系”。该书认为应在“中国文字学”这一学科下建立 21 个分支学科，具体如下<sup>②</sup>：

中国文字学概论、古文字学、汉字形体学、汉字演变史、汉字改革学、汉字字义学、汉字语法学、汉字教学法、汉字字典编纂法、汉字频率统计学、中国文字学史、汉字美学、汉字神经生理学、汉字心理学、汉字信息编码学、汉字文化学、汉字文化社会学、汉字哲学、少数民族文字学、比较文字学、现代汉字学

按照作者简述的每一“分支学科”的研究内容，汉字文化学的学科对象是“汉字与中华文化之间深厚、错综的关系”，并举出如《解开汉字之谜》、《字源谈趣》、《汉字文化漫谈》、《汉字古今谈》等，认为它们都是围绕中国文化展开论述的代表性作品；“汉字文化社会学”是“对汉字与中国社会结构、分层、流动、变迁之间的关系与其发展规律的探讨”，如王国维、郭沫若、闻一多的研究，不过“尚未有体系性的理论框架”；关于“汉字哲学”的解释还处于遥想时期，“对汉字进行哲学思索，建构有关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这是块未开垦的处女地。……由于汉字的特殊性质和独立地位，特别是汉字不适合‘能指与所指之间关系的任意性’原理，使汉字哲学必将与西方语言哲学大异其趣，独展新貌。”而“比较文字学”是将汉字与拼音文字比较，认为没有这二者的“异同分析，是不可能设想建立普通文字学的理论大厦的”。在这众多的分类中，“汉字文化学”、“汉字文化社会学”、“汉字哲学”等研究内容似乎有很多是重合的，而且尽管分法繁杂，却仍不知该把其他国家(比如日本)的汉字文化发展及研究归入哪一类合适。

汉字文化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与语言文化学有本质上的不同。1995 年《中国汉字文化大观》是将汉字文化学、汉字学、文化语言学当作同等关系来看待的，但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何九盈在 2000 年出版的《汉字文化学》中做了修正，指出汉字文化学应该属于文字学的分支。

余延在一篇论文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汉字的文化研究在当今已经发展为横跨汉字学和文化学这两门学科的新兴学科。”“汉字与汉民族社会、历史、风俗、文化、语言、思维等方面的彼此联系和相互作用机制，也还缺乏深层的揭示和理论阐发。因此，汉字文化研究工作的进步和发展，基础理论的建设是当务之急。”<sup>③</sup>

① 臧克和主编《汉字文化综论》，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 年 9 月，第 186 页。

② 苏新春主编《汉字文化引论》，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 年 8 月，第 233~238 页。

③ 余延《汉字文化的理论探索》，《汉字文化》2000 年 1 期。

### 3 汉字文化的界定范围

文字是人类创造出来的，是人类文明史上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比较特殊，既是物质财富，又是精神财富。

无文字时代人们靠有声语言沟通、交流，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交际需要逐渐复杂化，有声语言已经无法满足这一要求。这时人们会创造一些帮助记忆、帮助传达思想的方法，文字成为语言的有效补充手段。口头的语言是诉诸听觉的，具有一次性、不可重复的特点，无法传之于异地、留之于异时；而形成文字的语言诉诸视觉，扩大了传播范围，具有多次性，可以被反复阅读，时空都不再受限制。“把语言传至任何远方的可能性逐渐产生这样的结果：任何重大的政治的、科学的和文学的现象在某一个地方出现后，就会变成全人类的财富，并且促使人类联合成一个整体；言语得以流传久远的可能性则使得世世代代可以掌握前辈所取得的丰富知识，并在向前发展的道路上阔步前进。”<sup>①</sup>

文字是为记录语言而产生的，有了文字才有了历史记录，“语言使人类别于禽兽，文字使文明别于野蛮”<sup>②</sup>。古代四大文明发祥地的一个共同标志便是都拥有自源文字。中国文化在当时代表了一种先进文化，而先进文化或强势文化具有影响其他文化的力量。由于汉字具有完善的符号系统和信息系统，周边国家及民族在接受中国文化的同时也接受了其载体汉字，同时也把汉字本身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学习，并尝试将汉字变异、改造融入本土文化，汉字文化在不同语言的国度中展开，共同构成了汉字文化的内容，汉字因而走出故土而具有一定的世界性。

从目前关于汉字文化的主要论著来看，一般都把汉字文化的研究范围界定在中国，而不是汉字文化圈乃至整个世界，有意无意地把中国以外使用汉字的地区当成了附属。这样的研究严格说来应冠以“中国的”才更准确。中国是汉字的故乡，汉字随着中国文化，或者说汉字本身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传播海外，使用过汉字的地方，就一定会有汉字文化存在。中国的汉字文化以及其他语言国家的汉字文化都是汉字文化这棵大树上的分枝。二者密不可分，却又不可互相替代。诚然，汉字是在成熟之后才流传到别国去的，中国的汉字文化之枝条格外茂密，汉字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可以大书特书，但汉字在其他地区有着不同于中国的特殊表现，是汉字文化研究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同样值得重视，应与中国汉字文化同等对待。应探讨汉字文化在世界各地的文化意义和表现特点，而不仅仅局限在其本土中国。

## 第二节 汉字文化在日本各时期的发展状况

在日本，关于汉字的分期，一般与日本历史分期一致，分为以下几期：

古代，也称上代，从汉字传入到奈良时代末期。

<sup>②</sup> B.A.伊斯特林著，左少兴译《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2版，第20页。

<sup>①</sup> 周有光《世界文字发展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4月，第1页。

中古：自奈良时代末期到平安初期。

中世：包括镰仓时代和室町时代。

近世：江户时代至幕府末年。

近代：明治维新至二战结束。

现代：二战结束以后至今。

## 1 以词汇为中心<sup>①</sup>

日语的词汇按来源区分可以分为三类：一为“汉语”词汇，一为“和语”词汇，一为“外来语”词汇<sup>②</sup>。“汉语”词汇出自中国古代、近代汉语，用汉字书写；“和语”词汇为日语中固有的、自创的词汇，用汉字或假名书写；而“外来语”词汇则是近现代主要源自欧美语言的词语，一般用片假名书写，现在也有人称作“片假名词”。“汉语”词汇与中国文化密切相关，近代及现代关于日语中汉语词汇的研究一直都是热点，成果也比较多，对于日本的汉字文化研究颇有助益。由于“汉语”词汇一般用汉字标记，反映出的文化特色比较鲜明，因此这里将“汉语”词汇在日语中的发展变化作为叙述重点。

### 1) 汉籍佛经的传入带来了大量的汉语词汇

汉字随着人员的交流及实物的传入，很早就进入日本了。从实物看，公元1世纪时有著名的“汉委奴国王”金印以及铸有汉字的钱币，后来又有铸有汉字、图纹的中国铜镜等物品。随着中国文化的传播，汉字、汉籍从各种渠道传入日本。日本从接触汉字到使用汉字，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在早期是把汉字、汉语作为外文、外语来学习的。早期文献的记录方式以及古坟出土的5至6世纪的铁剑、铜镜上的铭文，主要是通过汉语来表现的，反映出日本人使用他源文字的汉语、汉字时的稚拙和活用情况。汉语词汇在这一时期开始进入日语是无疑的，如从“乌梅 ume”、“马 uma”的日语读音可以肯定，它们属于较早进入日语的汉语词，但究竟这一时期有多少词汇进入日语，现在还难以确定。

奈良时代的汉语词汇情况，可以从现在留存的“宣命”<sup>③</sup>中了解到一些。“宣命”有130多个汉语词，另外《万叶集》中也有一些。与中国文化相关的词语情况可见表1-1。

表 1-1 奈良时代汉语词汇与中国文化的关联

文化关联	汉语词汇
与儒学、老庄学说相关	乐、礼、孝义、孝子、义夫、仁孝、顺孙、节夫、博士、藐姑射山、无何有乡
与政治相关	功、斩、禄、阴阳寮、缘坐、强盗、过所、故杀、五位、散位、职事、诸王、瑞书、窃盗、大逆、大瑞、大保、内

① 本节资料源于柏谷嘉弘《汉语の变迁》，收入森冈健二等编《讲座日本语学4 语汇史》，明治书院，1982年1月，第48~69页。

② 日语中这三类词汇即分别写作“汉语、和语、外来语”，本书借用这些名称，但使用简体。引用书名均仿此。

③ 宣命：诏敕的一种，用汉字书写主要的体言及用言的词干，而用万叶假名(仅表音)写助词及用言的词尾。这样的用字方式称作“宣命体”。

	相、八虐、反逆、边戍、谋杀、谋反、远流、乾政官、大将军、有位无位等、镇守副将军
与度量衡相关	斛、斗、端、疋
年号	大宝、庆云、和铜、灵龟、养老、神龟、天平、天平感宝、天平胜宝、天平宝字、天平神护、神护景云、宝龟、天应、延历

与政治相关的词汇中，官职、罪科词尤其突出。罪科的词语的增加是大化改新以后吸收唐朝法制，锐意进取的结果，实行仁政就要大赦天下，因而增加了日语中原来没有的许多罪名。年号中的“大宝、神龟、天平、景云”等是中国使用的，而其他未见于汉籍，如果这些是日本根据汉字创的新词，那么这些年号就可以视作“和制汉语词汇”<sup>②</sup>的滥觞。

这一时期出现了假名，但还未完全定型。虽然佛经训读用假名的读物在829年(天长五年)已经出现，而且在《竹取物语》、《古今集》问世之前，假名的用途已经比较广泛，但直到931年(承平元年)才出现标记汉字字音的工具书《倭名类聚抄》。

自奈良时代末期到平安初期，为“唐风文化”的全盛时期。汉诗文盛行，佛教方面天台宗、真言宗传入，公立及私立学校相继开设，学问之风受到推崇，大量的汉语词汇进入日语。由于伴有训读的训点资料保存到现在的比较多，因而很多汉语词汇的源流都比较容易找到。假名的使用逐渐成熟，平安中期假名文学进入黄金时代。不过假名文学作品并非完全用假名创作，中间也夹用汉字，特别是汉字标记的词汇，而且数量上增加不少，读法也都已经确定下来。

据研究在假名文学作品中，汉语词汇所占的比重如表1-2所示：

表 1-2 假名文学作品中汉语词汇的比重

竹取物语	7.4%, 112 词	古今和歌集 和歌部分	0.6%, 15 词	枕草子	13.8%, 930 词
伊势物语	6.2%, 93 词	辞书部分	11.3%, 107 词	源氏物语	12.6%, 1888 词
土左日记	4%, 36 词	蜻蛉日记	7.4%, 320 词	更级日记	7.6%, 166 词

这些汉语词汇是把和汉复合词<sup>③</sup>也算在里面的，最初不满10%，到了中期便超过了这个数字，汉语词汇呈逐渐增加的趋势。在训读词较多的说话文学《今昔物语》中比例就更高一些，仅第31卷就有530词。

另外，《竹取物语》、《伊势物语》、《蜻蛉日记》、《更级日记》中的汉语词中有55%~75%与《源氏物语》的汉语词相同，这也说明平安时代中期上流知识阶层共同使用相当数量的汉语词汇。

假名文学作品的汉语词中一字词为23%~34%，二字词为45%~58%、三字词9%~15%，四字、五字词则骤减。一字、二字词合计达80%强。

② “和”指日本，“和制汉语词汇”就是日本人自造的汉语词汇。为避免与现代汉语概念相混，故这里借用日本的学术用词。

③ “和汉复合词”指一部分为日语、一部分为汉语的复合词语。

和汉复合词在奈良时代就已经产生，而这一时期出现更多，种类也增加了不少，汉语词被日语进一步同化，这也是日语词汇得以扩大的有效办法。参见表 1-3。

汉语のさ变动词在训点资料中常能看到，但其他词语则在训点资料中根本找不到，这说明平安时代的知识阶层在假名文学中使用汉语词汇时几乎是与和语无区别的。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训点资料中的汉语词多是抽象意义的词汇，而假名文学中的汉语词则属于具体意义的词汇，其中一部分已经几乎和日语完全一样了。

表 1-3 日语扩大词汇的主要方法

さ变动词	死す、制す、怨す、奏す、化粧す、追笑す、御览す、用意す
加上接尾词的复合动词	労たがる、气色ばむ
汉语词加四段动词语尾く	騒動く、装束く、彩色く
复合体的体言	今内里、韵ふたぎ節忌、名对面、御弟子、草がち
加接头词、接尾词的	故おとど、故大宮、あり様(やう)、さ様(やう)
复合形容词	执念(しふね)し、乱(らう)がはし、美美し、怠怠し、劳劳し、下众下众し、余所余所し (除了“劳劳”外，其他在汉籍中都无出典)

## 2) 中世时期汉语词汇的消长

这一时期公家势力衰微，武家掌握了实权，新佛教普及到民间，对文字的使用也从公家扩大到武家阶层。文学方面出现了雅语、汉语、俗语交织的和汉混用文的“军记物语”，连歌、谣曲、狂言风行，汉语词汇已经广泛扎根于日常生活，进一步与和语融合。由于禅宗的传入，新汉语词的读音为区别于过去传统“汉音”的“唐宋音”。从作品中的汉语词汇来看，军记物语中比例最大，室町时代即使是和文派的《徒然草》也有约 30% 的比例，以妇女、儿童为对象的《御伽草子》则有 13%。所举作品中的一字词为 11%~18%，二字词 65%~80%，三字词为 5%~13%。与平安时代相比，一字词、三字词减少，二字词呈增加的趋势。《徒然草》中 1380 个汉语词与《源氏物语》相同的有 243 个，占 18.4%，“天草本”《伊曾保物语》的 893 词中，有 79 个词与《源氏物语》同，占 8.8%。由于汉语词汇 85% 都是体言，因而在表达中占主要地位。不过平安时代的各假名文学作品中的汉语词汇 60%~70% 与《源氏物语》同，而中世汉语词汇与《源氏物语》重合的数量减少了许多，显然随着时代变迁，词汇有一定的消长。

## 3) 近世以后的新汉语词汇以二字词为主流

以江户时代为中心，德川幕府奖励儒学，以朱子学为官学，古学、阳明学等学派兴盛，各地开设藩校、私学、寺小屋<sup>①</sup>，儒学者辈出。随着儒学的普及，汉字的字音、字义都是得到确认之后才使用的。汉学兴盛，汉字成为研究对象。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将目光投向西方国家，并力图使自己跻身于近代化国家行列。国家兴办教育，致力

① 江户时代对平民子弟进行初等教育的场所。